

G40-0926/24

廖世承教育思想论稿

汤才伯 著

5518
11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廖世承教育思想论稿/汤才伯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ISBN 7-107-12074-3

I. 廖… II. 汤… III. 廖世承-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957 号

责任编辑:刘立德 审稿:邱瑾、王莉、吕达

廖世承教育思想论稿

汤才伯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9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60,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70

ISBN 7-107-12074-3

G·5184 定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廖世承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体系，尤在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等方面影响最大，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既从宏观上探讨了廖世承教育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影响，又从微观上具体论述了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内涵和构成，涉及教育目的论、个性差异论、课程论、教材教法论、教师论和学校管理论等各个方面。本书对当前教育改革有直接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学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更有借鉴价值。本书可供中学教育工作者及教育科研人员阅读，也是师范院校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如配合研读我社已出版的《廖世承教育论著选》，则更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一位执著追求的教育家	1
一、救国之路的求索.....	2
二、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	4
第二节 教育思想的形成	5
一、探索教育的社会职能.....	5
二、综罗古今中外，发掘精华.....	7
三、立足现实，注重创新.....	16
第二章 教育目的论	21
第一节 道德教育	22
一、什么是人格特性	22
二、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25
三、人格教育的内容	26
四、人格教育的原则	31
五、实施人格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34
第二节 知识教育	36
一、知识教育与人的发展	36
二、教活的知识，教活的个人	38
三、重在学习结果	41
第三节 体育	43
一、学校体育的重要性	43

二、学校体育的组织与实施	45
附：性教育的必要	49
第四节 职业教育	51
一、学校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51
二、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54
三、切实加强职业指导	56
第三章 个别差异教育论	59
第一节 个别差异教育的重要性	59
一、什么是个别差异	59
二、个别差异教育的重要性	61
第二节 个别差异的成因	63
一、遗传、环境和训练的因素	63
二、学生个别差异的分析	66
第三节 个别差异的了解和鉴别	70
一、实验和调查	70
二、智力测验	73
三、教育如何适应个性发展	74
第四章 课程教材论	78
第一节 学制改革与课程教材建设	78
一、“六三三”学制与课程教材改革	78
二、课程教材改革与人的培养	80
第二节 课程改革研究	84
一、编制课程的依据与原则	84
二、普通课程与职业课程	90
三、编制课程的方法和程序	94
第三节 科学地编选教材	96
一、编选教材的依据	96

二、编选教材的原则	98
三、编选教材的方法和组织	99
第五章 教学方法论	102
第一节 教与学的关系	102
一、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103
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107
三、学生课程负担不宜过重	110
第二节 教学组织形式评判	111
一、力主改革学级和学年制	111
二、适应个性，因材施教	115
三、加强课外活动	117
第三节 改革考试方法	119
一、诊断测验和考试新法	119
二、改进入学考试	121
三、毕业会考的弊端	124
第六章 教师论	127
第一节 师范教育是各级教育的基础	127
一、师范院校的使命	127
二、严格师范训练	130
第二节 教师是学校的命脉	135
一、理想教师的标准	135
二、教师应有的道德素养	137
三、教师应有的智能素养	139
第三节 教师的责任和作用	143
一、培植学生良好的品性	143
二、引导学生学习	147
三、转移学校和社会风气	150

四、为民众服务·····	152
第七章 学校管理论 ·····	154
第一节 学校管理者须具的资格·····	154
一、懂得教育原理·····	154
二、确具实验精神·····	156
三、有恒心毅力·····	159
第二节 学校管理者应有的精神·····	161
一、积极研究，不断创新·····	161
二、鞠躬尽瘁，不计成败·····	165
三、实事求是，实地去做·····	171
第三节 刚柔渗透的管理风格·····	175
一、教育与管理相结合·····	175
二、管理者的民主精神·····	177
三、创造校园的文化氛围·····	181
四、制定切实、科学的评价标准·····	184
 〔附录〕	
一、廖世承传略·····	186
二、廖世承简要年表·····	200
三、廖世承主要教育论著译作目录·····	205
后记 ·····	211

第一章 引 论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我国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投身教育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廖世承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凡教育心理学、高等师范教育、中等教育、教育测验及统计、学校管理等诸多领域,均有丰富的著述、卓越的实绩和宝贵的经验,是著名的高等师范和中等教育专家。

第一节 一位执著追求的教育家

廖世承自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到1970年逝世,整整半个世纪的从教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9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约30年。在这30年中,先后担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教授,讲授“教育心理学”、“测验与统计”、“中等教育”等课程;同时兼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主任(即校长)及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主任(即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因院务繁忙而未兼任该院附中校长。但他非常重视附中作为教师实验和学习实习基地的作用,有关附中的性质、任务、要求以及重大的措施,无不由他亲自规划厘定。他办理东大附中和光华附中的一些主张及举措仍被沿用。在这一阶段,廖世承主要精力用在对中等

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上，东南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院三所附属中学，就是他实验和实践的基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理很有特色，成效卓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0 年，是廖世承从教的第二阶段。在这 20 年中，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教育的信念更加坚定。相继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将他的后半生献给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高等师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最终实现了他毕生所执著追求的教育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服务的目标。

一、救国之路的求索

廖世承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师。虽家境寒素，仅靠束脩维持妻儿生计，但对子女期望极高，要求他们用功读书，成就事业，以光大门楣家声。廖世承在他的《我的少年时代》一文中说，他幼年天分并不高，但记忆力极强。三岁时，《荡寇志》上的图像，可以一一叫出名字；坐椅靠背上的小字都能认识。六岁那年进了私塾，八九岁时，《四书》、《五经》已经读了一半，并开始读《礼记》。因为觉得读书不费力，就顽皮不用功。对他的求学勉励最多的是他的同胞姐姐廖骊珠。而他父亲则经常用历史事实和富有趣味的故事给他以启迪。廖世承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说，当他听父亲讲故事时，每每眉飞色舞或慷慨激昂。他后来学习上的勤奋，事业上的执著，与家庭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的廖世承怀揣父母的殷切期望走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他十二岁时进家乡的中城高等学堂，后一年转到县立高小毕业班，十五岁毕业。旋即投考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中院。进校不到一个月，适逢国会试。参加会试的大、中院学生五六百人。廖世承以一个中学一年级的新生参加，其会试成绩居然在前四十名

内，还得到奖金。这次国文会试对少年廖世承是个极大鼓舞，坚定了他进取的信心，读书的倾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爱读武侠小说变为爱看学术书籍。在所爱读的学术书中，使他获益最多的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著作。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论断，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同时，廖世承对激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民吁报》发生浓厚兴趣，特别爱读渔父（宋教仁的笔名）的文章。《民立报》等激烈攻击清政府，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言论和行动，给廖世承以启发。这些报纸和书籍对廖世承具有政治启蒙意义，使他扩大了社会视野，放眼世界，看清清朝统治的腐败，不满君主体制。这时，廖世承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折，不再囿于父母的期望，进而关心国家的命运前程。

辛亥革命胜利，民国肇造。南洋公学中院五年改为四年，廖世承提前毕业，投考北京清华学校，并准备出国深造。在清华学习三年后，于1915年赴美留学，在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心理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廖世承学业取得重大成就，既获学士、硕士学位，又得博士考试资格（他的博士论文是回国后撰写寄去，后二年得到博士文凭）。他含辛茹苦，孜孜以求，终于如愿以偿。但对廖世承一生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外四年生活，他亲身经受了西方国家的种种歧视，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受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他立誓：“对于侮辱我的东西各国，定要争一口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廖世承尚在美国。他对国内发生的学生运动十分关注，表示坚决支持“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正义要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得寸进尺。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坐而待毙。廖世承对这种亡国谬论十分愤慨。他说，中国人“只有抵抗，才有出路”，“应做抗日的健全分子，牺牲小我，为民族争光。”外货充斥中国市场，国货不能畅销，他深感不安，主张“改良国货，推广国货，关税自主。”他认为这是“救时良药”。他常说，

一个民族要树立坚强的信念，齐心协力保国建国，争取生存和发展。

廖世承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并说过仅靠“教育”岂能“救国”。但从他的言论和行动来观察，他是从教育途径来探索救国之路的。他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不畏险阻，甘受清贫，是从救国救民出发，建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教育可以培植高尚人格，造就国民，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富国强兵。他说过“教育为立国之本”，“一个国家军备的优劣，财富的盈亏，政治的消长，实业的盛衰，文化的升降，与学校教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早在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时，廖世承就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亲友的劝阻和反对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一心一意出国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准备学成归国，从事教育工作，为国效力。1919年下半年一回国，他便立即投身教育改革实践。以后数十年，始终没有动摇过，后悔过。但只有到了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理想和抱负才真正实现。

二、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

廖世承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对反动政府的腐败、卖国，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一心寻求民族自救自立的道路，支持各种爱国行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悬半旗追悼。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干涉，强行拉下中国国旗。爱国师生激于义愤，群起脱离该校，另建新校，命名为“光华大学”。廖世承对爱国师生的这种义举，深为钦敬，义无反顾地受聘就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教育系主任和附中主任。其时，江浙两省有多处来聘请他担任要职，上海工部局也多次派人聘他担任华人教育处处长，许以高薪、花园洋房。廖世承不为所动，一概辞谢，全心全意与光华师生分担初创时期的诸多艰难。1946年，光华大学暨附中复校，廖世承辞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职务，回上海继

续担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附中校长。

从爱民族、爱国家，向往光明、民主，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廖世承思想发展的必然。上海解放时，他正在光华大学校长任上。他热烈欢迎解放，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光华大学获得了新生。他要求光华大学全体师生“为建设新光华、新中国而努力。”并明确指出：“我们有一条大路，就是努力改造自己。最主要的，须加强师生的政治教育。”从此以后，廖世承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尽职尽责，忘我工作。与党组织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他曾满怀激情地说：“几十年来我始终站在教育岗位上，并且认为，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人生最有兴趣最有价值的工作，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后悔过。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我对教育的信念更强了。”

第二节 教育思想的形成

廖世承从事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整整半个世纪。他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传统教育的精华，创造性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注重调查和实验，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心理科学、中学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理论。

一、探索教育的社会职能

中国教育自戊戌变法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教育先是模仿德国、日本，后又效法美国，其结果是“洋八股”代替了“老八股”。“老八股”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洋八股”依然如此。“老八股”的终极是学而优则仕。“洋八股”在教育制度上的反映是小学为了升中学，中学为了升大学，大

学为了出洋留学；在教育方法上则是“死读书”、“读死书”，与生活和社会完全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书呆子”，就是“洋腿子”。廖世承对这种教育痛心疾首，尖锐地指出：“我们办学的人不能努力解放青年的天才，一天到晚的工作，在创造一个呆板的模型。”廖世承认为，我国的这种教育无益于青年，无益于社会。

廖世承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的工具，教育的伟大力量在于训练精神，培植有理想人格的公民，而学校应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社会进步服务。早在 20 年代，他就在《申报》上撰文，论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深刻地指出，教育与社会息息相关，与社会各行各业的关系极其密切，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有着巨大的作用。他说：“一个国家军备的优劣，财富的盈亏，政治的消长，实业的盛衰，文化的升降，直接间接都与教育有关。”因此，“教育为百年大计，立国之根本”，“教育之事业为永久之事业，教育之问题为永久之问题。此事业此问题，当随时进行，随时解决，务适应时势。”

教育要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而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廖世承对教育脱离农村的现状大为不满。他在《教育与职业》一文中写道：“农村教育的重要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可是向来谈教育办教育的，对于农村教育明知其重要，但往往都向城市讨生活，很少躬亲陇亩，伏处乡村与农民子弟为伍，认定农村为终身职业的。惟其服务农村的寥若晨星，所以中国办学数十年，而农村教育依然不很发达。”廖世承主张办教育者应深入民间和乡村，了解民众生活，为民众服务。他在《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一文中写道：“教育界人士应该深深地忏悔，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致对于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痛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的是学校，不是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变成民众的学校。”廖世承在湖

南蓝田办国立师范学院时，身体力行，创办民众学校五所，每年招收失学儿童和成人千人以上，还为湖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等省设立在职小学教师进修班，为乡村学校培训教师。

教育是通过培养人为社会服务的。廖世承认为，只有有了良好的教育，公民受到充分的基本训练，才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的重任，而青年一代关系整个民族的隆替，社会的更递。现在在校的学生，以后就是社会的公民。当青年学生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德育、智育、体育都打下基础，确立为大多数人民增加幸福的“中心信仰”，有强健的体格，明理而有责任心，且有丰富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技能，并能运用知识和智慧，研究高深事理，意志坚强，不畏危难，从事革新社会的各项职业，便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

二、综罗古今中外，发掘精华

我国中等学校教育始于19世纪末叶。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制订了近代第一个新式学制(即壬寅学制)，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又颁行了“癸卯学制”，从制度上规定了中学的办学宗旨和修业期限。其后二十余年中，学制几度更易，时有变动，争论颇多。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即中等教育的职能；中学的办学标准；如何实施成功的中学教育。在办学宗旨上，晚清便有单一的升学预备与升学、职业教育并重的争论。民国初年，规定中学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1916年后，职业教育呼声渐高。1917年起，中学开始实行分科制，除普通科外，第二年起增设农、工、商等科。

作为中等教育专家，廖世承全面考察中学教育的现实状况，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得失，探讨西方教育的利弊，并在执掌东南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的实践中不断进行试验，开辟新路，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关于学制改革，廖世承的主张充分体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互相渗透的精神。他力主实行“六三三”制，认为这种学制所定标准符合中国实际，也适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有利于社会进步需要和促进平民教育的发展。他列举当时中学存在的主要缺陷，认为中学改革势在必行。这些缺陷是：办学无确定宗旨，从体制到措施都无法兼顾升学和就业两种趋势的正常发展；年限太短，四年时间，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均受限制；采用分校制，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他指出，在中学施行“三三”制，可以提高教育效率，给各地办学多留余地，促进中学体制改革，切实采用分科制、选科制，升班以学科为单位，可以促进中学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发展课外活动；可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顾及学生性别、能力、日后境遇等各种差异；可以促进教育普及，减少中途退学人数，减少小学生升学的困难。

廖世承对当时划一的教学标准提出中肯的质疑。以数学学科为例，是否每个学生都有必要接受很高深的知识，究竟有几个人会升入理科大学？他认为，分科制可使普通中学有效地增强职业教育成分，同时充分保证基础学科的教学；选科制则可体现学生共性与个性的和谐协调发展，在一定的必修课的基础上大力拓展选修课。廖世承主张制定一个各学科教学的最低水平标准，而把较高深的内容纳入选修课中。选修课不限于各学科的加深拓宽，还有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体、实践操作类型的课程，也可纳入其中。廖世承曾在《中学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一国的中学教育制度必须适合国情及地方需要。中国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的制度，恐不易适应各地的特殊情状；现行学制成立已二十余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彻底改革，必致引起纷乱。不如允许各地在有需要时，得设实验学校。如试行有效，准与现行中学同时设立；在未有各种类型不同的中学及选拔制度未能施行尽如人意以前，中学对于升学准备及就业准备仍须双方兼顾；不论升学或就业，中学教育的宗旨在充分发展各个人潜在的能

力,使他或她成为一个最快乐和最有用的人。

廖世承认为中学教育为完成普通教育和开始专门教育的时期;中学生又处于最活跃的文化阶段。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兼顾升学和就业的趋向,充分发掘潜在能力,取得学习效果,必须施行相当的指导。他又认为,教育指导、升学指导、择业指导、生活指导,就广义而言,都与职业有关。有鉴于此,廖世承强调首先要使学生对所学课程有一种意义上的认识。学校设置课程当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扩展选修课程,使各个学生有相当选择的机会,以适应他的兴趣、才力。学生对所学课程增添一份亲切感,这种学习就多一份意义,也就增加一份生气。其次,职业指导要引导学生到正当的途径上来,力争减少学生误入歧途。要使他们早些觉悟到自己的志趣和才力,不致荒废或贻误时机。再次,养成适合职业界的品性。他说:“求学、服务、做人是一贯的。求学切实的人,就会是服务勤恳的人,也就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反之,在校敷衍了事,不守校规,不爱惜公物,在社会服务,就欺诈骗取巧,营私舞弊。”廖世承在这里强调,良好品性的养成为立身行事之基础,这是与他重视学生人格培植是一致的。

在职业指导中,廖世承强调学业指导与职业指导的有机结合,增开职业陶冶课程,补充职业知识,强化职业训练;强调德育与职业指导的联系,兼顾职业道德的熏陶,开展课外活动,养成职业所需的品性;并主张辅以科学的心理测验与完备的学生档案,作为实施指导的依据;开展职业教育指导以引起家庭、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于课程改革与教学法研究。课程改革与教学法研究是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廖世承特别注重民族性、时代性与科学性的完美结合。“课程”一词原为拉丁文。按其原意就是“民族经验”。廖世承认为,一时代的课程就要代表一时代的需要。如古代希腊注重身体锻炼,意志的修养,因而学校课程只有运动与音乐两种;后来

社会渐趋复杂，有了获得科学知识的需要，于是增加了几何学、修辞学等许多新科目。“课程”既然反映民族经验，那么，民族发展有变迁，课程也应随之有所变迁。但我国近代中学课程设置，大多抄自外国，与我国国情、民族实况、现时生活极少联系。这是课程必须改革的根本动因。

廖世承认为，课程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首先要改变那种安于故常、不思改造的心态；其次要研究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目标；再次要排列出改革的阻力和困难，提高实施的效率；又次，要从社会调查入手，研究社会职业种类、规模、规格、社会生活对知识、技能的需求等，应充分认识课程是活的，社会、个人的需要也不会一成不变。

在课程改革中，廖世承十分重视西方课程论的研究和介绍。他认为西方课程论的某些基本观点值得借鉴。例如确定分类目标的依据，有人将中学教育目的分为“永久的目的”和“现今的目的”两大类；有人则分为“社会”、“经济”、“个人”三类，由此确定课程职能。廖世承提出，初中课程编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继续养成学生的共同观念，并逐渐注重分科选科办法，主要顾及基本知识技能与学生志趣差异两方面；第二，定夺和满足学生现时及将来的需要，特别要注重各地方的实际发展环境和学生的发展意向；第三，用本身有价值的课程教材，考察学生的兴趣、意向和能力，引起他们向上研究的心思，即不使个人徒受痛苦，空耗时日，积极引导学生。他主张学生上一些尝试课程，例如安排学生每两周轮流学木工、金工、电气、印刷等，而后定夺其志愿。廖世承强调高中课程编制以分科为原则，但专科限制不宜过严，仍应学习一部分普通教育必修科目，并注重人格陶冶。

廖世承十分注重教学的实际效果，重视教学法研究，主张发扬我国教育固有的优良传统。他深入研究当时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指